

河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统编教材

形势与政策

河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形势与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G641.41

1

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统编教材

形势与政策

河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
研究中心组织编写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势与政策/河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9
(2001.6 重印)

ISBN 7-215-04779-2

I. 形… II. 河… III. 时事政策教育—高等学校—教材 IV. G64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87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 字数 28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0 次印刷

定价:1.20 元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高校“两课”教材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訾新建

副主任委员 赵豫林 贾修国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马广先 | 马宜章 | 王东虢 | 王廷信 |
| 朱少均 | 李 创 | 李培臣 | 陈垠亭 |
| 罗建平 | 张宝明 | 张国富 | 张 琼 |
| 杨明亮 | 苗尤凤 | 周为群 | 周玉清 |
| 居占杰 | 范龙堂 | 武林双 | 赵豫林 |
| 袁庆璞 | 贾修国 | 葛坤英 | 訾新建 |
| 路 琳 | 穆伟山 | | |

《形势与政策》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余 丽 | 李自强 | 李献峰 | 陈汉生 |
| 陈忠禄 | 陈垠亭 | 赵豫林 | 姜大为 |
| 贾忠鹏 | 俞海洛 | 曹景富 | |

八十年前7月的最后一天,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红色的游船上,结束了—一个只有十几人参加的会议。从这一天起,一个将要改变中国社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这个政党就把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八十年风风雨雨,这个政党坚定如一地担当着中国人民的领航员;八十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这艘大船闯过了重重险阻,如今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驶向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一、担起民族重任

江泽民同志曾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作过精辟的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然而在近代中国,究竟采用什么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究竟通过什么道路才能步入现代化的大门,这一困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八十年的疑难,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才找到明确的答案。因此,八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正是承继了前80年中华民族未竟的使命。

就在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十年之后,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运动爆发了。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和正确思想指导的旧式农民运动,已无法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危机了。洪秀全的人间天国未来得及建成其政权却早已变质,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失败。

19世纪60年代初,一群怀抱中兴伟业的封疆大吏,在“自强”“求富”的旗下下,发起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只可惜他们试图在衰朽的旧体制上嫁接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并没有能挽回日下的清王朝振衰起废。随着甲午战争炮声的响起,自建的北洋海军的炮舰,一起沉入了滔滔的黄海之中。

战争的硝烟未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步入了政治舞台。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拉开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的序幕。无奈“离离维新梦,分明血泊中”。百日维新的

悲惨结局证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网罗”多么艰难，指望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来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是多么的一厢情愿。

百折不挠的斗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这场革命终于在1911年10月，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谁又料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很快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

历史证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步入现代化的道路无法打通。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后，中国陷入了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文化上复古逆流泛滥，民族危机有增无减。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点燃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的火把。作为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以儒家旧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启发了人们的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也开启了向中国引入新学问、新方法和新思潮的闸门，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恰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危机，连西方人自己都在哀叹“西方的没落”，这对于希望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的出路何在？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求新的答案时，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及《新青年》编辑的李大钊最先响应。1918年7月起，他接连撰文颂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称它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此后，一批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所占山东的领土及其他特权也转交给了日本。处于悲愤绝望中的知识界和学生界,开始孕育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1919年5月4日午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成为运动的指导力量。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更呈现出百说竞起、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由于对帝国主义的愤慨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思潮。一时间,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外,其他各种名目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等都流行开来,并且形成相应的信奉和实践团体,这就给爱国青年提供了充分选择和比较的余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为范例的可操作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日益青睐的对象。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形成。就在其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国工人运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迫切需要一个本阶级的政党来领导。因此,在中国成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已是一种客观趋势,其阶级基础、思想基础与干部条件业已具备。

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成立。此后,各地类似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经过各地小组的酝酿准备,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和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为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表明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这

也表明,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并最终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事实上,在次年7月的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规划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未来,从而明确宣示了中国先进分子八十年来苦苦探寻的答案。

二、缔造新的中国

有了明确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但她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具体道路。

建党初期,党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很快形成了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党认识到单靠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还必须联合其他进步力量。此时,经历了两次护法战争的失败,正处于极度苦闷之中的孙中山,也迫切需要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在共产国际及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帮助沉寂多年始终没找到出路的国民党走上了新生的路程,推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猛开展。此后,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可是,正当这场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伐队伍高奏凯歌时,国民党新右派使这场革命过早地夭折了。孙中山先生过早逝世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先是1925年6月、7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抛出了一套旨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的戴季陶主义。接着蒋介石于1926年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三十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腥风血雨中倒下了。

大革命失败了,但引起大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一点也没有改变。从血泊中站起来的中

国共产党人没有气馁，他们吸取血的教训，更加坚强果决地独自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而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因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1927年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此后，中国革命进入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时期。从1927年8月1日至次年年底，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毛泽东把秋收暴动的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先例。在开辟、建设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文章，论证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批驳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受共产国际影响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切实了解，中共中央多次犯“左”倾错误。1931年年初，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又占据中共中央统治地位。“左”倾领导人在党的一切工作上强制推行过左政策，在革命道路上照搬苏联经验，一味强调“城市中心论”。对同他们思想路线不一致的毛泽东等人，进行残酷斗争，并在组织上予以排斥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它造成的最直接危害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红军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减员90%。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党内斗争的胜利。正是这一生死攸关的斗争，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能力，形成了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为首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已被证明是中国革命获胜的惟一正确的道路。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基大西北，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随后日军势力不断向关内渗透，华北告急，此时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内大打“围剿”红军的内战，对外则一味妥协退让。面对空前加剧的亡国危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捐弃前嫌，放弃“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方针，并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为推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好了准备。

日本一步步加紧侵华，也严重威胁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全国民众不断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不能不有所改变，但仍不愿放弃“剿灭”中共的政策。西安事变打破了这一僵局。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受命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洞察秋毫，机智而和平地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共同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以此为标志，国共第二次携手共赴国难，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又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多次“摩擦”，克服了国民党投降倒退逆流，维护了统一战线。尤其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策略，不仅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同时壮大了自己，并逐步成长为抗战的主导力量。随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在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英勇抗击下，侵华日军也走到了穷途末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一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获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走到了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十字路口。

1940年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精辟地回答了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5年4月23

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再次阐明要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有各个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虽然有美国支持的武装精良的庞大军队,但它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早已丧失民心,其失败不可避免。而在政治上得到全国民众支持,经济上、军事上有着解放区人民大力支援的共产党军队成为了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于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

194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年前参加五四运动的精英们,经历无数的乡间小道,又回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中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们会聚于此,他们在酝酿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9月30日通过的会议宣言,正式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终于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任务,为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开通了道路。

三、探索强国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那就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宿愿。这将是一段更为漫长的路程,也同样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继续奋勇作战,追歼国民党残敌,至1951年

10月,解放了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在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民主改革,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外交上,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废除旧中国与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与一切支持和承认我国政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在农村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与朝鲜人民的并肩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为国家经济建设争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千头万绪,但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无疑是一项牵动全局的中心任务。为此,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不要四面出击”等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经过三年艰苦努力,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及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同时,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至此,党和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在人民心中,站稳了脚跟。

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告诉人们:一个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而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确立的历史发展构想。因此,在完成经济恢复任务以后,1953年中共中央即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等。这个计划确定的是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是在当时西方世界封锁和封锁情况下,以及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当时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新的设想,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提高,来加速工业化的

进程。

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向人们展示的宏伟蓝图，立刻激起中国人民从未有过的创造热情。原计划十五年左右“过渡”时间，实际只用了三年。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虽然由于速度过快，方式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以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遗留了一些问题。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我国还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工业部门开始建立起来。我国有了自己的飞机、汽车、新式机床、发电设备制造业，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制造业等，初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以及文化、科教、卫生等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相应改善。“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但是，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尤其是需要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1956年，国际国内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其中既有人们对新制度的美好憧憬所带来的欢乐，也有伴随新制度诞生的阵痛以及培育这个新制度所引起的困扰。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剧烈动荡。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要科学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一条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25日，经过中央政治局对国家34个经济部门的调查研究后，毛泽东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解决的10个方面的关系即矛盾问题。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构想。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明确指出，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这实际上指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应该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注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反对个人崇拜。八大还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突破了过去的模式，为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尝试。八大还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总之，党的八大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构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也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八大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科学地论述了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八大路线，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重大成果。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可能一直是直线式的。我们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时有偏离八大方向，以致造成了党内“左”的思想日渐抬头，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根源。与此同时，由于1957年经济工作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又使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经济建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同时，对稳健经济政策的批评又助长了党的领导人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倾向。此后，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浮夸之风开始盛行。在“大跃进”思想的指导下，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迅速在全国推向高潮。由此，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蛮干，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也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日趋困

难。

挫折和错误教训了中国共产党，从1960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心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调整首先从农村开始。1961年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大会以后，全面性调整进一步推开。同期，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顶住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巨大压力。到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到1965年，调整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也基本协调。

1966年5月，正当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开始施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泛滥既有党的领袖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也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和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这场由党的领袖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的动乱，持续了十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乱。但是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党内在如何看待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即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这表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实质，也没有足够的胆识去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反地，他不仅拖延阻挠对冤假错案的平反进程，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在经济上仍重复过去急于求成的“左”倾政策，使刚刚摆脱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又陷入比例失调的状态之中。因此，能否突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禁区，能否突破和否定“两个凡是”的禁锢，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邓小平等一批中央老同志的领导下，从1978年开始，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党展开，不久即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文革”之后中国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这场运动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